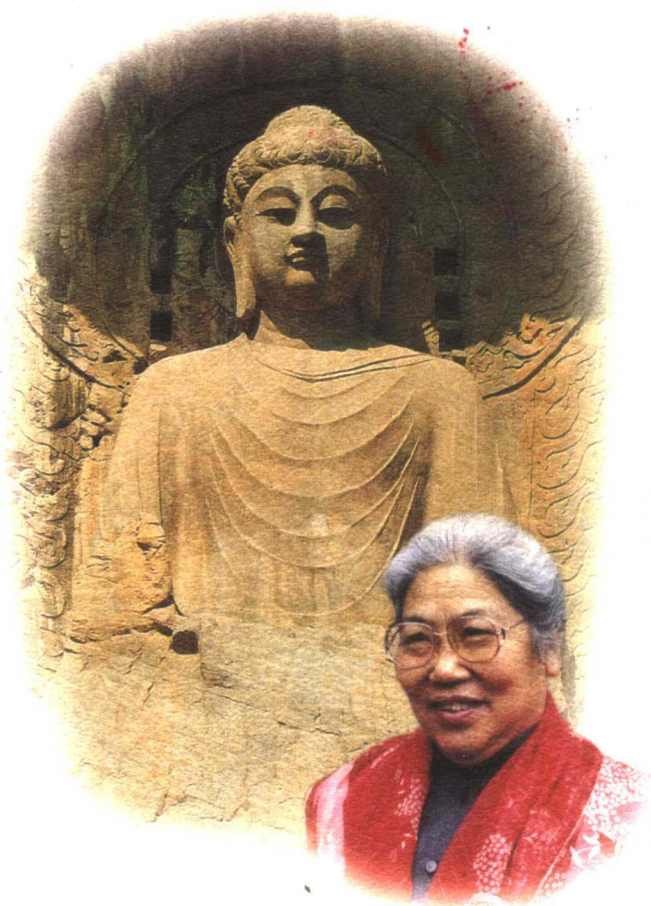


爱我河南人

近现代卷

编著 史道祥 笑凌等



海燕出版社

爱我河

近现代卷

主编 老铁
副主编 海继才

编著 史道祥
笑凌等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我河南人:近现代卷/史道锋等编著. — 郑州:海燕出版社,1999.9

ISBN 7-5350-1889-0

I. 爱… II. 史… III. ①名人-列传-河南-近代 ②名人-列传-河南-现代 IV. K820.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850 号

爱我河南人

近现代卷

编著 史道详 笑 凌等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新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84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ISBN 7-5350-1889-0/G·1014

定价:11.90 元

目 录

“独出冠时”的植物学家吴其濬	(1)
农民英雄白朗	(9)
革命文学的拓荒者蒋光慈	(19)
抗日名将杨靖宇	(28)
民族英雄吉鸿昌	(37)
过早陨落的将星吴焕先	(46)
“坠子皇后”乔清秀	(54)
新四军儒将彭雪枫	(61)
嵩岳名将张之朴	(70)
上甘岭上的无畏巨人孙占元	(80)
“满身泥土气”的诗人徐玉诺	(89)
“空中飞龙”杜凤瑞	(99)
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史家嵇文甫	(108)
豫剧“樊戏”的开创者樊粹庭	(116)
狼牙山壮士宋学义	(124)
著名文学家冯沅君	(132)

时代诗人李季	(140)
新中国农业科技事业的开拓者陈凤桐	(150)
农民小麦育种专家龚文生	(158)
现代建筑学家杨廷宝	(166)
戎马一生的许世友	(174)
大山里走出来的翻译家曹靖华	(184)
富有传奇色彩的哲学大师冯友兰	(192)
杰出女性邓颖超	(200)
人民的好医生石磊	(210)
从战争中走出来的音乐家时乐濛	(218)
豫剧大师常香玉	(227)
五笔字型的发明者王永民	(235)
太行公仆吴金印	(243)
乒坛圣手邓亚萍	(252)

“独出冠时”的植物学家吴其濬

清末，京城礼部右侍郎吴烜官邸：门庭若市，张灯结彩。

这是府主人四十岁寿辰的日子，大金寿字贴于正堂，寿堂两旁，红杏、金菊、仙人掌等奇花异草簇拥。

看到这么多葱郁的花草，小公子吴其濬好奇极了。他正望着一盆仙人掌发呆，一位客人走过来戏问道：“吴公子，仙人掌为什么不长叶子，也不开花呀？”问得吴其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不料，这一为难，使聪明而孤傲的小公子立下了弄明白大自然奥秘的志向，从而走上钻研植物学的道路。

九年“丁忧”故园情

吴其濬，字季深，又字淪斋，号吉兰，别号雩娄农，河南固始县人。1789年3月1日（清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初六）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封建官僚家庭。

吴其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所以博览群书，在科举考试上一路顺风，并在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考中状元。这是河南在清代惟一的一名状元。

在读书—科举—走仕途的封建社会的成材圈子里，“以天下为己任”才算是干大事。一个时期，吴其濬曾把自己儿时对植物学的兴趣埋藏在心里。在他中状元的第四年即1821年（道光元年）7月，父亲吴烜不幸病故于京城，吴其濬与哥哥吴其彦一同辞职，扶柩回到河南固始老家“丁忧”（为父亲守孝）。不意1823年（道光三年）伯父吴邦治、兄吴其彦相继谢世，1825年（道光五年）母亲许氏又病逝，这样他守孝便长达九年。

豫南固始县地处淮河流域，气候湿润，山清水秀，植物繁茂。吴其濬购得城东南十里、史河东侧名为李家花园的十多亩河湾地，开辟为植物园，还取了个雅号叫“东墅”。他在这里雇人栽上桃树，插上柳枝，同时还种了不少蔬菜。三四年之后，桃树果实累累，柳丝青青，菜畦星罗棋布……吴其濬没有沉浸于这宜人美景之中，白天，他悉心观察这些植物的细微变化，精心描绘着一花一叶的形态；入夜之后又潜心研究采得的标本，翻阅本草文献，考订种种植物的药性、功能。不幸的是，后来山洪暴发，他的“东墅”植物园被淹没殆尽。看到自己心爱的植物标本浸泡在洪水之中，他痛心极了，于是带着干粮逆史河而上，一直到达河的源头，考察这里的水流状况，并写下了《治淮上游论》一文，建议加强对淮河的治理，他认为，治河必先治淮，而治淮必先治理淮河上游；治理淮河河段的关键地点不在江南，而在安徽境内。

九个年头的守孝生活，吴其濬收获颇丰。他对植物的生长周期、特征、性能有了一个深切的了解，积累了宝贵而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的植物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乐此不疲的业余爱好

1830年(道光十年),吴其濬守孝期满,辞别故乡,来到京城,开始大半生的宦宦生涯,并先后任职于湖北、江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南、浙江、福建、山西等九个省,真可以说是“宦迹半天下”。

勤于政事之余,吴其濬始终没有放弃对植物学的研究,并且乐此不疲。他每到一处,都刻意留心草木,一遇所需之物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弄到手。一次,他穿行在人声喧嚣的闹市中,看到一个山民挑担入市,担中有一种植物,花叶硕大,正是自己寻觅了很久的“鬼臼”,这种植物生在深山之中,北方的人见得很少,江南虽有人植于园圃之中供观赏,但是像这样叶大枝长的真可谓稀罕物,于是他急忙让山民停下担子,购得后欣喜若狂。还有,他的党参标本是派人从深山中掘得;豆叶标本是过庐山时,派人上山采得。他在江西为官四年,采集标本就有四百多种,平均三四天要采一种。进行植物学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观察外形,有的还需品尝味道。吴其濬一度弄不清“楚石蒜”和“雷公凿”的区别,待拿到雷公凿后,亲口一尝,果然味道不同。

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不致闭塞,吴其濬十分虚心地向有经验的下层劳动人民学习。他认为,乡村的医生、放牛的小孩、砍柴的樵夫、种田的农民,他们对植物的认识,要比士大夫高明得多,遇到问题要不耻下问,就是对小孩子也不可轻看。为了弄清楚一种植物的名称、性状,与类似植物的区别,他常常深入农家虚心求教,或邀请土医认真询问,一点也没有屈辱失尊的感觉。当他弄不清“薇菜”的用途时,便去询问种菜的,终于得到了圆满的回答:此菜有结

实的和不结实的两种,结实者豆可以食用,不结实者茎叶可以食用。他在研究“芜菁”时,发现有的书上把“芜菁”和“萝卜”放在一起,有的书上说二者的区别在于根部,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后人不加考证而广泛引用。他对此感慨良多:如此简单的问题,去问一问老农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吴其濬十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他采集标本后,除观察、分类之外,还留心着植物学文献的搜集与考订。不仅《神农本草经》、《南方草木状》、《新修本草》、《开宝本草》、《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本草纲目》、《救荒本草》等专业典籍是他的必备书目,而且每次读经、史、子、集,一旦有涉及草木的资料,他都立即摘录下来,然后根据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进行印证。据说他研究植物学的手稿就有数十箱之多。

吴其濬没有把植物学的研究当成贵族玩乐的雕虫小技。他说,大自然没有虚生任何一种植物,天生一种东西必然有它存在的意义。既然任何植物都有它的特有的功用,那么植物应无贵贱之分,人们决不能轻视那些“贱”的植物而不去研究它们,应该对所有的植物进行研究,使山中小草,皆有扬眉吐气于阶前咫尺之地的可能,以便物尽其用。他还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并非深奥莫测,其规律皆潜藏于事物本身,只要细心发掘,必可使之昭然于天下,从而造福于人类。

著成《植物名实图考》

吴其濬对植物学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两书中。这两部书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

年)由继他出任山西巡抚的陆应谷整理并作序,在太原刻板印行而面世。

《植物名实图考》共七万一千余字,三十八卷。本书记载植物名称一千七百多种,所载植物分布全国十九个省,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植物学著作。其中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多载植物六百多种。他把植物分为谷类、蔬类、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类、木类等十二大类,每种植物都述其形状、性味、产地、功用,尤其重视药用价值说明和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的考证,对前世文献中记载过的植物,他都一一注明了出处;书中附图一千八百余幅,而且图谱精美准确,形象逼真,可直观地看出各种植物的特征。

《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第一部以植物命名的植物学著作,这部书不仅记载内容广博准确,而且严谨科学,纠正了前人的许多舛误。如在植物的描述上,他能够对其产地及生长环境,从初生到开花结实的整个过程,从形体特征到色味药用,都加以全面评述。他尤其注意抓住植物的典型特征,着重对花和果的描述;对某些结构较为复杂的花果,他运用解剖学的观察研究方法,把一朵花、一枚果的各个部分,分门别类地肢解下来,弄清各部分的生长位置、形状、颜色、大小,然后再加以评述,这与现代科学对植物学的研究和分类方法是一致的。对那些确实存在而人们还不认识,或过去的本草中也没有记载的植物,以及形状、性味相似而名称不同者,他都如实记载,从不主观臆断,妄下结论。此外,他经过自己考察,还发现了许多前人的讹说,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纠正和补充。如“冬葵”条中,他通过调查了解到这种植物在当时仍被江西、湖南等地

作为“百菜之主”，便纠正了李时珍的“今人不复食”的谬误。他还发现《本草纲目》和《群芳谱》对苜蓿的记载差异很大，就两次派儿子赴京、陕寻找苜蓿种子，亲自培植观察三年，终于澄清了《本草纲目》上记载的“苜蓿”，实际上是“木樨”，系音似而致误。

《植物名实图考》的姊妹篇《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共二十二卷，收入植物八百三十八种，实际上是一部植物学的资料汇编。书中述及一种植物的名称，便将前人关于该种植物的研究成果罗列其后，这些资料包括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南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唐朝官修《新修本草》，宋代的《开宝本草》，还有《名医别录》、《药性论》、《救荒本草》等著作，共计八百多种，不仅资料完备，插图精良，而且是以实物印证文献确属准确无误者才引用的。所有这些为后人从事植物学研究大开了方便之门。

成为传世杰作

吴其濬所著《植物名实图考》的贡献，还突出表现在它对后世的影响之中。

陆应谷在《植物名实图考·序》中，虽寥寥数字却评价甚高：“包孕万有，独出冠时，为本草特开生面。”意思是说，这本书内容极其广泛，风格非常独特，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为植物学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张绍棠在翻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时，看中了《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插图，于是将原图抽去四百多幅，换上后者插图，翻印成一本明代人撰文、清代人插图的误本《本草纲目》。裴鉴、周太炎合著的《中国药用植物志》，贾祖璋、贾祖珊兄弟的《中国植物图鉴》，都有不少内容来自吴其濬的著作。直到现在，植物学家在

鉴定植物种类、翻译植物名称时,仍无不以《植物名实图考》为准,药物著作专家在整理本草书籍时,也无不以《植物名实图考》为蓝本。我国目前的植物志中,以之命科名的有十余种,标名属名的有五十余种;在大学有关院系,《植物名实图考》至今仍是大学生的必读书目和必开课程。

《植物名实图考》成书之后,便引起国际植物学界的重视。1870年,德国学者布瑞斯内德所著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中,对此书推崇备至,认为图鉴“刻绘尤极精审”,“其精确程度往往可资以鉴定科或目甚至种”,他还翻刻商陆、佛手等图八幅,用连史纸拓印附在其著作中,以表明“言之有据”,认为“欧美植物学者研究中国植物必须一读……”1880年,《植物名实图考》第二版印出后传入日本,正值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学者得到此书,立刻奉为主臬(比喻准则或法度),1883年即翻刻为《重修植物名实图考》,风行全国。1885年,东京大学第一位讲授植物学的学者伊藤圭介着手将此书翻译为日文。1888年,日本出版了小型木夹版式《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本。1940年牧野富太郎著的《日本植物图鉴》,不少地方也取材于该书内容。当然,由于时代局限和作者未及亲自整理,《植物名实图考》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材料繁简不均,少数植物名实不符等等。但是,瑕不掩瑜,吴其濬的植物学著作至今仍不失为世界性的植物学传世之作。

值得称道的是,吴其濬并未因其对植物学的研究而荒疏于政事,相反是政绩卓著。他不仅办案秉公执法,而且经常深入民间,体恤民情,为百姓做些有益之事,特别是他出任云贵总督期间,深入矿区考察,大力拓展云南采矿业;在清末外敌入侵,民族矛盾日

爱我河南人

益严重的时候,他从维护民族大义出发,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在湖南、山西为政期间,他尽力查禁鸦片,对有功人员大力表彰;他反对外国侵略,但同时主张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并且预言五百年后,“一定能够验证我的主张”。吴其濬一生廉洁奉公,他最后任山西提督盐政时,查封非法盐税银一万两,毫厘未动,全部上缴了国库。

1847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吴其濬病故于山西,葬于老家今河南省固始县汪棚乡八里松。道光帝因其为政清廉,特地下诏书加恩其子孙,以表彰他的节操。

(史道祥)



农民英雄白朗

20世纪初期的河南,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政治黑暗,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广大群众纷纷起来反抗,武装斗争遍及全省。其中活跃在豫、陕、鄂的白朗农民起义军,是众多农民起义军中的佼佼者。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成为民国初年震惊中外的一次农民大起义。

官逼民反

白朗,河南宝丰县大刘庄人。字明心。1873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随父参加农业生产。后来家境日渐低落,于是,年轻的白朗除种田外,还常常外出赶牛车拉盐和开炉场炼铁,以赚钱贴补家用。

1908年,三十五岁的白朗因不甘忍受本村豪门地主的欺压,和一姓王的地主发生了冲突,结果被官府抓起来囚入大牢一年多。在牢中,白朗多次被狱吏敲诈、吊打、侮辱。这些事激起了白朗对清朝统治的极大不满,也使他在心中结下了与官府和地主不共戴天的仇恨。

出狱后的白朗生活无着,只好在外赶车拉盐、开炉场,借以维持家人的生活。1911年,全国革命风暴骤起,各省纷纷响应武昌起义。受清朝政府严密控制的河南,虽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但苛捐杂税依然不减,这使得起来造反的农民武装越来越多。宝丰、鲁山一带就活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队伍。被生活逼迫的白朗,怀着对官府的深仇大恨,也加入到这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之中。

1911年夏秋,白朗在他的家乡宝丰集结了一些穷哥们儿,组织起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开始了他的斗争生涯。身材高大魁伟的白朗性格刚强憨直,为人和气,乐于助人,而且见多识广,因而威信很高,深得弟兄们的喜爱,大家总是亲切地喊他“官大哥”(公众的大哥),有事也都爱和他商量。

起义初期,白朗军不仅人员少,而且武器装备也很差,只有土铳(当地人称“笨炮”)和钢刀,衣服更是不像样子,冬天大多数人身上只有一件破棉袄,所以有人称他们是“袄片队”。但他们打起仗来却个个敢冲敢杀,非常英勇。

白朗拉队伍起义不久,正值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但转眼间,袁世凯又篡夺了辛亥革命的领导权,当上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一个前清的官僚,摇身一变成了河南的都督,河南成了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地区。仗着袁世凯的势力,张镇芳在河南横征暴敛,作威作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穷苦百姓怨声载道。于是,揭竿而起的白朗,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袁世凯的反动政权。

打富济贫

白朗起义之后,高扬“打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帜,号召穷人参加反抗斗争。每到一地方,打击富豪劣绅,开粮仓、砸钱庄救济穷人,受到穷苦百姓的支持和拥护,队伍不断扩大。

1912年春,宝丰县知事张礼堂要卸任回省城开封。此人在宝丰做官时贪赃枉法,搜刮民财无数。为了惩罚这个贪官,白朗和弟兄们仔细研究制定了周密的打劫计划。

张礼堂深知自己民怨颇多,担心自己携带的赃款会出麻烦,想来想去,决定求助于宝丰县西边杨庄的地主杨小端。杨小端则写信给宝、鲁一带最大的农民武装头头杜启斌,连骗带吓,要他保护张礼堂的安全。杜启斌虽说也是农民武装,却心怀“招安”之想,满口答应。其他几支农民武装碍于杜启斌的情面,只好放弃劫杀。惟独白朗不向贪官屈服,下决心要给张礼堂一点颜色看看。

到了张礼堂离开宝丰县那天,白朗一早就带着众弟兄埋伏在城东北张礼堂的必经路旁。不多时,十几个带枪的保镖,簇拥着几辆满载赃物的大车从城中走了出来。张礼堂正自得意,只听“砰”的一声枪响,白朗已带着二十多个弟兄冲到他眼前。张礼堂看到不是白朗的对手,丢下钱财仓皇逃命去了。

白朗出师大捷,不仅劫得了赃物,而且还缴获了十几条快枪,张的儿子也被他扣下做了人质。无奈,张礼堂只好又给白朗送来十几枝好枪。

这一仗,使白朗军实力大增,威名远扬,也吓坏了官府。新任县知事先派出四五百人的反动武装前去“剿匪”,被白朗起义军杀

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后又改行招安。在官府诱骗下,杜启斌率先向官府投降。白朗识破了官府的奸计,拍案怒斥前来劝降的官差,继续坚持斗争。而杜启斌等人投降官府后即遭监禁,不久便被杀害。这时,受官府欺骗的农民武装认清了官府的真面目,纷纷携带武器投奔白朗。这些人多数是宝、鲁一带的穷苦农民,后成为白朗起义军的骨干。这时白朗军已迅速增加到五百多人。

转战豫鄂

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白朗深知,要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坚持长期战斗,必须避开反动势力集中的地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时还要争取广大穷苦百姓的支持,在广阔的农村与敌周旋,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白朗军战术极其灵活多变,必要时一昼夜急行军二三百里,尤其善于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摆脱官军的追剿,在迂回运动中避开敌人主力,同时相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为了不被反动势力吃掉,保存力量坚持斗争,白朗决定南下发展。1913年春天,白朗带着队伍经宝丰东北方向穿过郟县,攻进禹州。南下的半年时间,白朗在舞阳以南的几个县和桐柏山之间穿插迂回,流动作战,使反动政府只闻其名,不见其影,富豪劣绅闻风丧胆。为争取穷人的支持,白朗以身作则,严明军纪,秋毫无犯,高扬“打富济贫”的旗帜,每攻下一个寨堡,除留下军饷外,其余财物全部分给穷人,于是生活无着的饥民纷纷加入起义军。白朗军迅速扩大至三千人,有了相当的战斗能力。第一次和北洋军的正规部队开火,是在泌阳东北的小铜山。当时白朗军设下埋伏,将北洋